

- [3] Arco JL, Fernandez FD, Heilborn VA, et al. Demographic, academic, and psychological profile of students attending counselling servi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Granada, Spain[J]. Inter J Advan Couns, 2005, 27: 71-85.
- [4] 肖世君. 大学生心理疾病污名、自我效能感和专业心理求助态度的关系研究[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7.
- [5] Eisenberg D, Hunt J, Speer N. Help seeking for mental health on college campuses: review of evidence and next step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J]. Har Rev Psychiatry, 2012, 20(4): 222-232.
- [6] 张静. 大学生心理疾病污名、领悟社会支持与寻求专业心理帮助态度的关系研究[D]. 开封: 河南大学, 2019.
- [7] Vogel DL, Wade NG, Haake S. Measuring the self-stigma associated with seeking psychological help[J]. J Counsel Psychol, 2006, 53(3): 325-337.
- [8] 陈洁. 浅析心理疾病病耻感对在校大学生求助行为的消极影响[J]. 教育教学论坛, 2016(12): 72-73.
- [9] 陶钧, 郑亚楠, 唐宏. 大学生精神卫生知识知晓、对精神障碍患者歧视状况对专业性心理求助态度影响的调查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 2017, 44(3): 474-477.
- [10] 姜海燕. 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心理求助的关系研究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 [11] Komiya N, Good GE, Sherrod NB. Emotional openness as a predictor of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seeking psychological help[J]. J Counsel Psychol, 2000, 47: 138-143.
- [12] Masuda A, Anderson PL, Twohig MP, et al. Help seeking experiences and attitudes among African American, Asian American, and European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J]. Int J Advancement of Counsell, 2009, 31: 168-180.
- [13] 安莉娟. 大学生专业心理求助与安全感及社会领悟支持的关系[J]. 中国学校卫生, 2010, 31(6): 656-657.
- [14] Borowa D, Robitschek C, Harmon KA, et al. Posttraumatic stress and growth instudent service members and veterans: the role of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J]. J Am Coll Health, 2016 (1): 1-8.
- [15] 白汉平, 肖卫东. 个人成长主动性、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8 (5): 72-74.

(收稿日期: 2019-12-17)

我国校园欺凌研究述评

郑亚楠 常春英 廖慧云

校园欺凌是各级学生遇到的最为常见的人际暴力。相关研究表明,约 1/3 的中、小学生曾受过校园欺凌^[1]。校园欺凌已严重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校园安全与秩序。探寻校园欺凌的原因、预防校园欺凌的发生,针对校园欺凌者进行相应的教育,已成为目前校园管理、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重要研究内容。近年来,我国各级学校已开始关注校园欺凌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本文归纳、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以期为学生思想政治与心理健康教育改革、学生管理制度的创新提供参考。

1 校园欺凌概念界定

一般认为,各类学生受到老师、同学的持续性身体攻击或心理性攻击均可视为校园欺凌,这些攻击行为会造成受害者持久的精神痛苦^[2]。2016 年 4 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将校园欺凌界定为“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行为^[3]。校园欺凌指同学之间的欺凌,不包括老师及校外人员对学生的欺凌。校园欺凌的方

式包括肢体攻击,也包括言语攻击或精神侮辱,还可以指网络或现实中的造谣、恶意中伤等。本研究将校园欺凌定义为“发生在校园及其辐射区域内的、在同学之间发生的恶意身体、心理方面的攻击或侮辱,包括肢体攻击、言语攻击或恶意中伤等多种手段,可以导致欺凌对象在身体、心理等方面受到损伤”。

2 校园欺凌评估工具的研究

目前,国内针对校园欺凌的评估问卷的研究主要采用 Buss-Perry 攻击量表、Olweus 被欺凌问卷、直接和间接攻击量表(direct and indirect aggression scale, DIAS)等。因为文化差异可能造成的评估偏差,上述问卷均经过本土化研究,可用于评估国内校园欺凌,如张文新等^[4]对直接与间接攻击量表在小学生和初中生群体进行的本土化研究、余毅震等^[5]对 Olweus 被欺凌问卷在初中生群体进行的本土化研究以及 Buss-Perry 攻击量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本土化修订^[6],这些问卷已在我国校园欺凌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但上述问卷修订过程中均发现,部分分量表的内在一致性系数明显低于国外研究,这可能与文化差异有关。而评估不同类型的学生的校园欺凌情况是否能选用同样的量表也存在争议,如 Buss-Perry 攻击量表在不同学生群体中修订的维度存在差异。因此,应编制更适用于我国本土文化背景下的校园欺凌问卷,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应有不同的评估量表。

DOI: 10.19521/j.cnki.1673-1662.2020.04.023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Y19205)

作者单位:341000 赣州,赣南医学院心理学系(郑亚楠),农村医学教育研究中心(廖慧云);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学工处(常春英)

3 校园欺凌与被欺凌现状调查

了解目前国内校园欺凌的现状并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应的教育教学改革,对减少校园欺凌有着重要的意义。陈小龙^[1]对 4 434 名中学生进行调查,发现 96 名(2.2%)调查对象在过去 1 年存在欺凌行为,589 名(13.3%)调查对象在过去 1 年存在被欺凌;贾昊男等^[2]对 949 名大学生进行回顾性问卷调查,发现 148(15.60%)的调查对象在初中阶段存在被欺凌现象。这些研究多为校园内的“身体欺负与被欺负”,言语欺凌相关成果较少;而研究对象多为中、小学生,大学生校园欺凌与被欺凌成果罕见,其原因可能在于研究者认为,大学生因年龄、身体素质、学业经历等原因,更不容易被“身体欺负”。但这种观点恰恰忽视了大学生在言语欺凌与被欺凌方面的研究。同时校园欺凌的研究多集中于校园内,对于网络等其它载体的校园欺凌研究较少。上述研究表明,大学生校园欺凌、言语欺凌及网络欺凌,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关注。

4 校园被欺凌者心理健康研究

被欺凌者的心理问题及干预研究,一直是各类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者关注的领域。王哲等^[3]采用焦虑自评量表和校园欺凌问卷对 2 340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小学时被欺凌的经历对大学的焦虑状态有预测作用,而中学时被欺凌的经历对大学的焦虑状态则没有预测作用;张紫薇等^[4]对 1 649 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欺凌者、受欺凌者、欺凌-受欺凌者以及旁观者的均有较高的抑郁水平。针对被欺凌对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补救措施,将成为未来各级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任务。

5 校园欺凌与被欺凌发生的社会心理因素

探讨发生校园欺凌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宣传以减少校园欺凌,也是目前教育工作者的重要研究任务。王健等^[5]对 884 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农村地区、男生、饮酒、上网、体型偏瘦会增加校园欺凌的风险,而父母关心能够降低校园欺凌发生率,并建议中学应有针对性的创造积极健康的校园环境以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郭俊俏和赵必华^[6]通过对 2 364 名 4~9 年级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教师支持和学校归属感能够降低学生被欺凌行为。探索各级各类学生校园欺凌与被欺凌的社会心理因素,是未来校园欺凌研究与教育的重要领域,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6 校园欺凌的防治与教育

根据研究成果,有针对性的设计相应的教学课程与宣传环节以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是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课题。王茜等^[7]提出,检察机关在预防校园欺凌时有重要的优势,通过宣传、严格依规处理校园欺凌事件、建立学校—社区—家庭的联动机制,对减少校园欺凌行为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曾楚翹等^[8]提出加强学生法制意识的培养能够降低校园欺凌行为。但与上述校园欺凌社会心理机制方面研究结合不紧密,“两张皮”现象较为明显,缺乏针对影响因素开展的教育与宣传活动。同时,各类校园欺凌的防治与教育手段均为主

观设计,是否有效缺乏量化评估。尤其是人格、心理资本等心理学视角探讨教育方法的研究匮乏。这方面研究未来仍需进一步加强。

7 未来的研究趋势

目前,国内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小学,针对大学生的研究较少,关于校园环境、手机依赖等因素能否影响大学生校园欺凌的研究还有所不足;其次,校园欺凌的研究多集中于身体攻击,对于言语欺凌的研究较少;第三,针对校园欺凌教育方案的设计,与已有关于校园欺凌的社会心理因素结论脱节,且研究多为质性研究,对于提升效果的量化研究不足;最后,已有校园欺凌的研究工具多为国外问卷,尚未开发适用于我国文化背景下的校园欺凌问卷,尤其是关于言语欺凌的评估问卷匮乏。此外,校园欺凌的法律问题研究、网络欺凌以及在心理健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课程中融入预防校园欺凌的研究,也将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 [1] 颜湘颖,姚建龙. “宽容而不纵容”的校园欺凌治理机制研究[J]. 中国教育学报, 2017(1): 10-14.
- [2] 张心怡. 校园欺凌发生原因与防治对策研究[J]. 中国校外教育(下旬刊), 2019(4): 36-37, 79.
- [3] 任海涛. “校园欺凌”的概念界定及其法律责任[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7(2): 43-50, 118.
- [4] 张文新,武建芬, Kevin Jones. Olweus 儿童欺负问卷中文版的修订[J].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9, 9(2): 7-11, 37.
- [5] 余毅震,史俊霞,吴汉荣. 直接和间接攻击行为量表的信效度研究[J]. 中国学校卫生, 2005, 26(1): 6-7.
- [6] 刘俊升,周颖,顾文瑜. Buss-Perry 攻击性量表在青少年中的初步修订[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9, 17(4): 449-451.
- [7] 陈小龙. 中学生求助行为的特征及其与校园欺凌和非自杀性自伤的关联研究[D]. 南昌: 南昌大学, 2019.
- [8] 贾昊男,姚宁,王亚蒙,等. 大学生初中阶段校园欺凌情况回顾性调查[J]. 中国公共卫生, 2018, 34(8): 1171-1181.
- [9] 王哲,李洪杰,王苗,等. 过往校园欺凌经历及获得支持情况对医学生焦虑状态的影响[J]. 中国学校卫生, 2019, 40(2): 236-238.
- [10] 张紫薇,楼超华,钟向阳,等. 校园欺凌中不同角色与抑郁的相关性[J]. 中国学校卫生, 2019, 40(2): 228-231.
- [11] 王健,李春枚,谢飞,等. 江西省高中生校园欺凌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 2018, 39(12): 1814-1817.
- [12] 郭俊俏,赵必华. 教师支持对 4~9 年级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学校归属感的中介作用[J]. 中国特殊教育, 2019(1): 72-76.
- [13] 王茜,张济洲,金峰. 基于检校共建视角下校园欺凌社会化综合防治体系的构建[J].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2019(1): 75-79.
- [14] 曾楚翹,史可,杨连峰. 用法治意识预防高中校园欺凌问题初探[J]. 法制博览, 2019(12): 26-28.

(收稿日期:2019-12-17)